

顾颉刚选集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天津人民出版社

11.3-116. /5

11.3-116. /5

11.3-116. /10

顾颉刚选集

王熙华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述集丛书

顾颉刚选集

王燕华 编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8·875印张 3插页 319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0010-1/K·2

定 价：6.90 元

1/1011/2



顾颉刚像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方面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初步拟定为五十种。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介绍本选集内容及特点的前言，以及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本丛书是由中国南方图书公司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编辑的。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为积累文化、传播科学理论做出贡献。

编者前言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卓越的贡献，蜚声国内外学术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他撰述宏富，各种著述合起来约有一千多万字。我在整理他的遗著时，觉得除了编辑出版他的全部著述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外，还应编一本选集，供一般读者阅读，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能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这个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感到无限的快慰。

这本选集所收的文章只有他全部著述的三十分之一，数量虽然少了一些，但其内容却基本上反映了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可以使读者对他有全面的了解。所收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学术渊源、研究古史的方法和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由来；
- 二、古代史事的论述及史料的考辨；
- 三、古代地理的论述及史料的考辨；
- 四、神话、传说和歌谣的研究。

顾颉刚先生的全部著述目录，如一一开列和罗列各种版本，约有数万字。这样的目录，除了专门研究者需要参考外，一般读者是不需要的，所以书末所附著述年表，仅列他的主要著述。一文多处刊载的，也仅列现在最易觅得的一种书刊名称

和版本，以免冗繁。读者如需了解其全部著述目录，可参阅拙编《顾颉刚先生学术纪年》（载于《纪念顾颉刚先生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出版）。

限于编者的水平，在文章选择、学术评介和著作年表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煦华

1986.5.4

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生于江苏苏州市。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康尔典、劳育、周望等。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解放前，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等高等院校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疑古思想是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顾颉刚先生则是这一时期疑古思想的代表。他继承了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收了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科学知识，创立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的古史记载，作了系统的详尽考辨，揭露出它们原来大多是出于神话传说。他的大量的切实的考辨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的工作，既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扫清了道路，又提供了经过考订的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

顾颉刚先生还以为古代史书和神话本是一物，必须先了解神话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义，所以他对我过的古今

神话、传说及歌谣等也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继承郑樵、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他说：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他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的看法则来自胡适和钱玄同。他说，胡适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使他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知道“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钱玄同则使他“辨清了今、古文家的真面目”（《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所以他说：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这就是顾颉刚先生的主要的学术渊源，但他也受到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的深刻影响。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既可以用来建设真古史，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这更增强了他推翻伪古史的信心。由于有了这些优越的条

件，再加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的影响，这就使顾颉刚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

1922年，顾颉刚先生在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时，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古史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流传起来的，伏羲、神农是在战国以后出现，就更晚了。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

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态；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真是精当绝伦”（《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可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以上引自《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一册）

胡适的概括可以说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使用方法说明书，告诉人们如何使用它来研究古史传说。

为了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先生又提

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

- (1) 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
- (2)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 (3)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 (4)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答刘胡两先生书》，
载《古史辨》第1册)

以上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郭沫若对它作了公允的评价，他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

郭沫若能捐除早年的成见，作出这样的公允评介，体现出了一个大学者的度量。他这种重真理超过感情的科学态度，更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导源于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考信录提要》上）“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补上古考信录》卷上）之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崔述不能把他的零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系统的理性认识。过了一百多年，由顾颉刚先生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成为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它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

思想方法，标志着我国的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突破“考信于六艺”的框框， 揭露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 神性，是由神演化为人

古书上所讲的唐、虞以前的古史，前人早已指出是荒謬无稽的神话传闻和后人伪撰的史迹，不可相信。但对尧、舜、禹时的古史，则认为有《尚书》的《虞夏书》可据，可以相信。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也始于尧、舜。“五四”以前，孔、孟的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绝对的权威，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是“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所以他们的辨伪只敢辨唐、虞以前的伪史，只敢辨“经书”以外的伪书，不敢对尧、舜、禹这些大圣人有所怀疑，不敢对“经书”有所怀疑。清代杰出的辨伪大师崔述说：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说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于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于《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于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崔述这样大胆疑古辨伪的人，尚且不敢违反道统，有悖于孔子之意，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所以顾颉刚先生公开怀疑尧、舜、禹，怀疑经书，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发表，不仅封建卫道者群起而攻之，就连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也囿于传统的成见，不以为然。他说：

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一章）

可见怀疑“经书”中所记载的尧、舜、禹为伪史，在当时是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顾颉刚先生的怀疑“经书”，怀疑古圣，突破司马迁以来“考信于六艺”的框框，闯入前人所不敢进入的禁区，表明他的辨伪与前人的辨伪有了根本的差别，他已由儒者的辨伪发展为史家的辨伪。

关于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是从神演化为人，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扼要的论述。他说：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1929年，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对三皇五帝的来源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以后又将讲义改写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

和历史》及《三皇考》两文，说明“三皇是战国末时势造成的，至秦而见于政府的文告，至汉而成为国家的宗教”（《三皇考·引言》）。三皇传说出于“太乙生两仪”哲理的神话化，同时秦皇的传说又出于黄帝（即上帝）等神话的演化。“五帝之说，大约是战国后期起来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出于五色天帝的神话，《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出于创造和依托。他还写了《鲧禹的传说》和《夏史三论》，论证禹是社神和夏史传说很多出于神话演化。至于五帝、三王的道德功业，则是战国后的学者为了一统的需要编造出来的。

三、破除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 来一统的观念，探索古代民 族和地域的实际情况

两千余年来，大家信从《帝系姓》、《五帝德》上的上古世系的说法，以为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出于一元，又信从《禹贡》、《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以为中国的疆域在黄帝时已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了，地域也早就一统了。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些传统的说法不符合先秦的历史实际，都要打破。

就民族来说，他指出春秋以前并无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鄅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楚、夔出于祝融，他们各有各的始祖，并不出于一元。春秋以后，大国攻灭小国，疆域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

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也渐渐归到一条线上，于是这些始祖在《尧典》中有了先后的君臣关系，尧、舜、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就在《五帝德》、《帝系姓》、《世本》等书中出现了。这些书中的牵合混缠的传说，决不能胡乱承认。后来郭沫若也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编）。因此，研究古代史时应消除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依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再就地域来说，他指出战国以前也无一统观念，夏代的国都虽有阳城、阳翟、帝丘、晋阳和安邑等不同的说法，但总离不开现在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带着一点河北省的南端。商大约起自东北，灭夏而占有中原，比夏多出了东北方。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的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灭商而入主中原，地方就又扩大了一些，增加了西边的老家渭水流域，又新辟了南土，延伸到申、吕、许，即今河南省的南部。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春秋以后，楚国疆域日大，始立县制，晋国继起立县，又有郡，至战国而郡县制普及。此时，越灭吴，统一了东南；以后楚东向灭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统一了淮水和长江流域。秦灭义渠和蜀，统一了西北和西南。齐向海边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部开拓，又统一了许多异族的地域。因此，中国的地域统一，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扩大，战国二百余年的兼并，到秦始皇完成的。《禹贡》、《职方》、《王会》以及《尧典》和《史记》等

所说的地域一统，是战国、秦、汉时的情况，而不是如这些书上所说的自黄帝以来早就定局的地域。因此，必须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而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在这方面顾颉刚先生不仅自己写了不少关于古代地理的论文进行深入的探索，而且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来倡导和组织古代地理的研究，以探索古代民族和地域的实际情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国内外的学者所瞩目，称之为“禹贡派”。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揭露奴隶社会残酷剥削的真相

顾颉刚先生指出把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古代就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官撰的《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就他们的轨范；要行一件事，说不出理由，只会说我们的占卜上是如此说的，若不照做，先王就要“大罚殛汝”了，我就要“致天之罚于尔躬”了。那时的田亩都是贵族的私产，人民只是奴隶，终年服劳不必说，加以不歇的征战，死亡的恐怖永远笼罩着。试问古代的快乐究在那里？战国时的一班政治家为了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古王的道德功业于是高到极点，好到极处。于是异于征诛的禅让之说出来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来了，《尧典》、《皋陶谟》等极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来了。从后世看唐、虞真是何等